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我国106个城市的调查数据

李荣彬, 张丽艳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辽宁 阜新 123000)

摘要: 本文基于我国106个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 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对我国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有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实现了身份认同, 但他们在认同愿望和内心认同上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其中内心认同要明显低于认同愿望。这说明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在现实中不是同质的和单一维度的, 而是复杂的, 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其中制度支持、个体特征、社会资本和城市体验这四个维度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 流动人口; 身份认同; 因子分析;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2) 04-0078-09

A Study of Floating Population Self-identity Present Situation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06 Cities in Our Country

LI Rong-bin, ZHANG Li-yan

(Public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Law, Liaoning Technology University, Fuxin 123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of 106 cities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analysis the identity statu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re than half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realizes the identity, but their identify desire and inner identity show many differences, including heart identity to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dentity desire. This shows that the ident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reality are not homogeneous and single dimension. It is complex, and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including system support,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social capital and urban experience this four dimension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plays a unique identity, the role that cannot be replaced.

Key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identity; factor analysis; influence factors

收稿日期: 2012-04-11; 修订日期: 2012-05-21

作者简介: 李荣彬 (1989-), 河南信阳人,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 劳动与社会保障、人口迁移。

一、研究背景

“身份认同”作为一个社会化的概念，是世界各国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身份构建理论把“身份认同”看作是一个从一般性到特殊类别的过程^[1]。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流动人口不断地从农村迁入城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社会生活的场所发生了巨大的变换，从同质性的、情感性的传统乡土社会进入异质性的、工具性的现代城市社会，他们的身份也将面临一个重新构建和确认的过程^[2]。然而由于受到传统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流动人口只能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性领域及空间里，并逐渐沉淀为城市边缘人口^[3]。面对着以国家权力为保证的制度性强加身份，他们毫无选择的自由，只能被动地认同和接受^[4]。再加上来自于制度的、社会的、文化的偏见和歧视，这更加强了流动人口对作为城市局外人的“农民身份”的心理感受，从而造成了其身份认同的困境。改革开放以来，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发生了一系列变革，我国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也正经历着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再到国家认同的过程，这一变化不仅要求国家在制度层面和经济层面给予支持，而且在心理层面和文化层面也要予以接纳。因为只有在心理上适应和融入城市，身份上得到当地社会的认同，流动人口才能真正融入当地社会，并最终完成市民化的过程。

目前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和制度层面。有学者将农民工区分为“明确定位为农民的回乡型、模糊定位的徘徊型、定位为市民的滞留型”，并进一步指出制度障碍、土地牵制、交往局限、社会歧视阻碍了滞留型农民工的身份转换与身份认同^[5]；而王春光则从城乡社会空间和群体社会记忆的互动视角考察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揭示了农村流动人口的代际区分以及二者在身份、社区等认同上的差异，指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较第一代流动人口在身份认同等方面更具模糊性^[6]；彭远春则从流动人口的主体角度探讨了影响身份认同的因素，他指出大多数流动人口的身份呈现出模糊化的认同状态，且进城期望和城市体验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起着独立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7]；此外，郭星华通过对北京市的流动人口进行调查后发现，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在现实中并不是同质线性 and 单一维度的，而是复杂的、多维度的，并且呈现出身份认同的二重性特征^[8]。

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针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研究逐渐从制度性的宏观层面过渡到流动人口各个主体内部特点的微观层面，不再局限于体制内的因素，而是更多地引入社会性因素。但是以往的研究大多以局部性、小范围的调查为主，偏重于对个别省市的研究，缺乏全国性的考察。本研究正是从全国范围内进行考察，目的是了解目前我国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真实情况。

二、研究设计

1. 研究假设

场域理论认为，场域是个体按照某一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设的，是集体的符号竞争和个人参与社会生活的主要场所。但是身份认同作为个体的重要惯习，又必须通过生活场域中各种“外在性”的现象加以体现。正如彼得·布劳所说：“流动的人不能简单地抛弃旧有的角色属性和角色关系，但他们如果不接受新的角色属性，不建立新的角色属性，那么他们就不能适应他们的新位置。迁居到城市的农民，其社会生活毫无疑问地要受到农村背景和所处城市环境的双重影响”^[9]。因此，我们假设流动人口有着一定的个人禀赋和制度支持，在某些场域中他们会在无意识中不断提取记忆中“我是谁”的意象，从而对现实中自我身份进行感知和判断（即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但是流动人口到底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这又需要从“身份期望”的角度来加以考察。随着城市经历的不断丰富和社会资本的日益积累，他们会对城市产生强烈的情感体验，并且在行动取向、价值取向、情感取向等方面逐渐融入当地社会，而后他们就会确定一个关于自我身份定位的期望（即想成为当地市民），从而完成自我角色的转化，实现身份的认同。通过以往的研究可以发现，进城期望和认同意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身份认同的实现，但是由于存在固有的乡土情结和社会记忆，身份认同也会面临着失败的危

险。基于此,笔者提出制度支持、个体特征、社会资本、城市体验四类研究假设,以期望能对流动人口的认身份认同现状进行深入分析,详见图1。

图 1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图

(2) 个体特征假设。任何一个客体事物都具有众多特性, 根据某一群客体所共有的特性而抽象出来的概念就是我们所说的特征。这里探讨的个体特征是指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 它具体指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社会地位、职业、家庭状况和居住地点等。我们知道个体对某种行为过程或事物的认同是以个体对该行为或事物的关系为参照系的, 当这种社会关系具有积极的、良性的特点时, 主体对其认同的程度就高, 反之则低。因此,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实现与他们的人口学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 基于此我们假设: 流动人口在年龄、职业、社会地位等方面越具有比较优势, 则越有利于他们的身份认同, 反之, 则不利于他们的身份认同。

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越丰富，他们的身份认同度就越高；反之，则越不利于他们的身份认同。

(4) 城市体验假设。社会距离理论认为：由于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差异使得个体与社会发生联系时所产生的情境常常具有不可匹配性和不可接纳性。当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之后，他们的生活场域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身处在城市的场景中，他们必须与当地人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互动，甚至包括那些他们知之甚少或者从未有过联系的人。这种转瞬即逝的交往方式，使得他们面对这个“陌生”又“新奇”的城市，常常既感到惊愕又感到焦虑；既品尝着欢欣，又经历着痛苦^[13]。然而城市毕竟有着不同于农村的文化特质、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或多或少会接触到现代性的思维 and 理念，在无意中吸纳和接受了城市的特性。因而他们会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城市体验，在无形中消解原先固有的乡土记忆，不断地增加城市元素，从而在心里产生对城市的理解和认同。因此，笔者假设：流动人口对城市的正面体验越多越有利于他们实现身份认同，反之，则会阻碍他们的身份认同。

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1) 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资料来源于 2010 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流入地对流动人口进行的连续断面调查的动态监测数据（2010 年共调查两次，本文的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下半年的调查），主要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区）的 106 个城市，其中包括 4 个直辖市，27 个省（自治区）的省会城市，5 个计划单列市，46 个地级市，24 个县级市。本次调查采取重点抽样和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抽样（PPS）相结合的方法。实际调查了 122670 名 16 ~ 59 周岁、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的流动人口。

(2) 变量及其测量。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是指流动人口对城市的接纳和认同程度。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此次调研的实际情况，以“您是否同意融入本地人当中”作为因变量，用来测量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度。该变量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包括两个等级，选择“同意”意味着流动人口愿意抛弃农民的身份，在主观上实现身份融合，在身份上完成市民化；选择“不同意”意味着流动人口排斥城市，并且出现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不愿意融入城市。然后我们以制度支持假设、个体特征假设、社会资本假设和城市体验假设四个维度共 14 个指标作为自变量引入模型，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度进行测量。具体各个变量的赋值及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定义及单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描述	变量赋值	均值	中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是否同意融入本地	同意 = 1，不同意 = 2	1.12	2.00	0.46
自变量	制度支持				
	社会保险	参加 = 1，没有参加 = 2	0.93	2.00	1.387
	社区选举	参加 = 1，没有参加 = 2	1.15	1.00	0.404
	听证会	参加 = 1，没有参加 = 2	1.04	1.00	0.258
	个体特征				
	性别	男 = 1，女 = 2	1.45	2.00	0.497
	户口性质	农村 = 1，城市 = 2	1.32	1.50	0.642
	教育程度	初中以下 = 1，高中 = 2， 大学 = 3，研究生及以上 = 4	3.70	3.00	1.366
	婚姻	未婚 = 1，已婚 = 2	1.25	1.00	2.203
	社会资本				
	就业状况	就业 = 1，失业 = 2	1.20	1.00	0.725
	月收入满意度	满意 = 1，一般 = 2，不满意 = 3	2.20	2.00	1.452
	换过几次工作	0 次 = 1，1 ~ 2 次 = 2， 3 ~ 4 次 = 3，5 次以上 = 4	1.93	1.00	1.905
	流动范围	省际流动 = 1，省内跨市流动 = 2， 市内跨县流动 = 3	1.67	2.00	1.120
	城市体验				
	困难求助谁	同事 = 1，当地人 = 2， 亲友 = 3，其他 = 4	3.07	3.00	1.434
	生活水平满意度	满意 = 1，一般 = 2，不满意 = 3	2.57	2.00	1.448
	交往意愿	愿意 = 1，不愿意 = 2	1.30	1.00	1.555

资料来源：2010 年下半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下表如未作说明，资料来源均与表 1 同。

三、数据结果分析

1.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现状分析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实质是其不断摒弃乡土情结，超越传统二元户籍制度，实现市民化的过程。由于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我国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呈现出一种不断跨越同时又不不断断裂的情形：一方面，他们以农民的视角去观察城市，体验城市，渴望融入其中；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城市户籍，他们不能真正融入其中，只能成为城市的“边缘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他们身份认同的困难。于是他们只能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做“候鸟型”的循环流动，呈现出一种“钟摆状态”，在农村和城市的对立和接纳中形成了“二重性”的身份认同^[14]。那么，作为流动人口，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身份呢？他们身份认同的现状又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情形呢？基于此，笔者利用 SPSS 17.0 软件对调查问卷中 6 道关于流动人口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并从中提取出两个公因子：认同愿望和内心认同，详见表 2。

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之前，对这六个指标的区分度、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本文采用 KMO 检验法，分析结果得出的 KMO 值为 0.711，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 球形检验给出了相关矩阵是不是单位矩阵的检验结果（原假设为相关矩阵是单位矩阵），卡方统计值为 9181.378，自由度为 15，在 0.000 水平上显著，拒绝原假设，说明相关矩阵不是单位矩阵。通过以上各项统计指标的检验，各个指标的共同度大部分在 0.6 以上，两个因子的累积贡献率为 64.03%。表明这六个指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下的多元回归法对各个因子的得分系数进行了估计，所得的结果见表 3，接着我们以每个指标的因子得分系数为权重，计算因子得分；同时又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社会认同的综合得分，本文称之为“认同度”。样本中每个指标都是定距变量，且都有“完全同意”、“同意”、“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这四个选项，我们分别对其进行赋值，所得的分数依次是 4、3、2 和 1。因此，每个因子在每一指标上的理论最大值为 4 分，最小值为 1 分。因为认同愿望因子包括两个指标，所以其理论上的得分区间为 [2, 8]，同理可知，内心认同因子的理论得分区间为 [4, 16]。而总体认同包括认同愿望和内心认同这两个公因子，所以其认同度总体得分区间理论上应该为 [6, 24]。因此，如果各项所得的分值越大，则表明流动人口越倾向于融入城市，其身份认同度越高；反之，则表明其身份认同度越低。

由表 4 可以看出：首先，我国流动人口身份总体认同度较高。总体认同得分均值为 16.22，比理论中值（15.00）高出 1.22 分，这表明我国已经有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实现了身份认同。同时

表 2 流动人口的自我身份认同		
题目	因子载荷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1：认同愿望		
1. 我关注我现在居住城市的变化	0.76	0.32
2. 我喜欢我现在居住的城市	0.75	0.13
3. 我感觉本地人总是看不起外地人	0.71	0.45
4. 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	0.74	0.52
因子 2：内心认同		
5. 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当地的一员	-0.42	0.70
6. 无论挣多少钱。我也不可能成为本地人中的一员	-0.41	0.69
特征根值	1.36	1.77
方差贡献率	39.22%	24.81%
累计方差贡献率	64.03%	

表 3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因子得分系数		
题目	提取公因子	
	认同愿望	内心认同
1. 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	0.292	0.047
2. 我关注我现在居住城市的变化	0.316	0.307
3. 我喜欢我现在居住的城市	0.316	0.282
4. 我感觉本地人总是看不起外地人	0.288	-0.013
5. 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当地的一员	-0.179	0.586
6. 无论挣多少钱。我也不可能成为本地人中的一员	-0.175	0.528

表 4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度的均值、中位值和标准差						
因子	题目数	平均数	标准差	理论中值	实际分数范围	理论分数范围
总体认同	6	16.22	1.41	15.00	6.00~24.00	6.00~24.00
认同愿望	4	11.14	1.06	10.00	4.00~16.00	4.00~16.00
内心认同	2	5.07	0.76	5.00	2.00~8.00	2.00~8.00

问卷中的问题“您认为是否能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也能从侧面对我国流动人口身

份认同的现状进行说明：其中有 11.3% 的人选择完全了同意；65.2% 的人选择了同意；只有 23.5% 的人选择了不同意或完全不同意，由此可见我国有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已经实现了身份认同。此外流动人口的认同愿望和内心认同得分比较高，且超过了理论中值，这表明已经有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在心理和现实两个方面同时实现了认同，但是认同愿望和内心认同也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其中内心认同度要明显低于认同愿望。通过研究发现：认同愿望得分均值为 11.14，比理论中值（10.00）高出 1.14 分，而内心认同得分为 5.07，只比理论中值（5.00）高 0.07 分，流动人口的认同愿望度比内心认同度高出 10 个百分点，这表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是多维度的和复杂的，其内部存在着不平衡性和差异性。

2.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流动人口这一群体具有过渡性、边缘性或者说是二重性的特点。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他们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是市民，但是在城市人的心里，仍然把他们当作农民，其结果是他们身处农村和城市两种相互摩擦和冲突的文化和身份中，成为典型的“边缘人”和“城市过客”^[15]。事实上，虽然许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其活动已成为流入地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他们可能依旧具有较强的“打工心态”和“过客心态”，将流入地社会当作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认为自己的“根”在家乡^[16]。这种心态使大多数流动人口将自己的未来定位在农村，认为自己只是暂时寄居于流入地而已，对流入地社会没有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始终保持一种“陌生人”的感觉。流动人口这种漂泊的感受和心态十分普遍，而这正是其缺乏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表现^[17]。

本文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以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度为因变量，以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制度支持、社会资本和城市体验作为自变量，在 SPSS 17.0 软件的操作中采用“Backard Wald”方式逐步回归，经过筛选和剔除，所得结果如表 5 所示。

(1) 制度支持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制度上的种种限制无疑是造成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困境的最主要因素，从表 5 的结果来看，社会保险变量和社区选举变量通过了模型检验，说明这两个变量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具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可以说制度假设在本文得到了验证。

传统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限制了流动人口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的路径^[18]。虽然大量的流动人口生活在城市之中，他们却不能享受城市提供的公共物品、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待遇，只能作为边缘化人口暂时寄居在城市，很难真正融入其中，更别说实现身份的认同。同时，由于这种排他性和

歧视性制度的存在，流动人口在心理上拉开了与城市的距离，从而逐渐远离主流社会，造成身份认同上的困境。此外，由于大量的流动人口的基本社会权利被剥夺，失去了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社区选举等一系列的社会待遇和政治权利，大量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形成“流动但不定居，定居但不融合”的局面，从而造成“心理市民化”和“身份农民化”的二元相悖，严重限制了流动人口的身份转化。如在调查中发现，有超过一半（59.5%）的人不能享受到当地的社会保险待遇，而只有 1.9% 的人拥有当地的社区选举权，社会待遇和政治权利的巨大差异很容易导致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

表 5 流动人口身份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B 值	S. E.	Wald	Sig.	Exp (B)
制度支持					
社会保险	1.930	0.643	6.387	0.000	2.032
社区选举	0.242	0.312	5.327	0.000	1.024
个体特征					
性别	0.643	0.576	2.126	0.012	1.273
教育程度	-0.824	0.722	2.341	0.010	0.784
社会资本					
换过几次工作	-1.443	0.521	4.980	0.000	0.674
流动范围	1.132	0.798	2.226	0.012	1.565
城市体验					
生活水平满意度	0.540	0.437	4.428	0.000	1.101
交往意愿	0.455	0.388	3.332	0.001	1.082
常数项	-2.243	0.774	15.432	0.000	0.316
调整后的 R ² =0.679					
F =6.224					
Sig. =0.021					

中断,从而把他们排斥在城市之外,并重新推向农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流动人口不可能长久地居住在城市之中,返回农村是他们无奈而理性的选择。

(2) 个体特征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从表 5 来看,个体特征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有一定的影响,其中性别和教育程度通过了模型,因而可以说个体特征变量在本文中得到了验证。通过研究发现,性别变量(以男性为参照组)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有着正向的影响,女性的身份认同度是男性的 1.273 倍。分析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女性有着强烈的团聚意识和陪伴的需要,出于生活安定的考虑,他们更倾向于在一个城市定居,而不是到处流动;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被打破,现代女性在心理上对自己的期望并不弱于男性,再加上大多数女性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普遍要高于男性,流动妇女在迁移到陌生人社会后往往能够发挥积极作用,“部分妇女能够在搬迁地通过积极策略寻求自己的存在点,筹划自己的生活”^[19],当她们进入城市后,她们受到尊重的程度可能比在家乡时更高,因而可以说,“迁移流动打破了农村妇女单一的生活和生存状态,使她们体验了前所未有的生活经历。她们积累着对城市生活正面和负面的感受和经验,并融进对自己的生活道路和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和建构”^[20]。

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教育程度(以初中及以下学历为参照组)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起着显著的负相关作用,根据表 5 可以看出,高中及以上学历被调查者的身份认同度比初中及以下学历被调查者认同度低 21.6%。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一方面,由于教育程度高,他们在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必然和其他流动人口群体不同,这样也就引发了他们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城市体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屏蔽制度的存在使得他们面临着“空间漂泊”和“心理漂泊”的双重生存状态,他们在社会交往和社区参与的过程中常常感受到歧视和排斥,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在心理上常常游离于城市之外,无法对城市产生好感,从而影响他们的身份认同感和城市归属感。这种情感的产生又会拉开高学历者与城市的距离,导致歧视和排斥,进而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不断阻碍着高学历者的身份认同过程。

(3) 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从表 5 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假设也得到了验证,其中“换过几次工作”和“流动范围”通过了模型。研究发现,“换过几次工作”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起着反作用,即换工作的次数越多,越不利于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这和广东省 1995 年的调查数据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城市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工作变动是十分频繁的。由于就业市场的二元化,大量流动人口不能进入正规部门,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工作的不稳定性,再加上没有福利待遇、社会保障等,使得他们不得不经常更换工作,从而造成与企业的联系脆弱,在心理上对城市产生一种隔膜^①。因此,有学者指出:“跳槽”正是农民工不适应城市环境的表现,也是他们企图寻找更易适应的环境的表现^[21]。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肯定,流动人口从事不稳定性或边缘性工作,对其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具有不利的影响。

此外,流动范围对身份认同也有一定的正向影响,流动范围越大,越有利于实现身份认同。但是我们在对流动范围的大小进行具体研究时发现,流动范围和身份认同度呈现出明显的倒 U 型关系,即跨省流动自我身份认同度低于省内跨市流动自我身份认同度,而省内跨市流动自我身份认同度却高于市内跨县流动自我身份认同度。这种相悖的结果并不妨碍我们对现实状况的解释。一方面,大多数入怀着很高的目标,远离家乡,进入一个距家很遥远的城市,他们非常希望融入当地社会,成为当地市民。因此,他们会有意识地调节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协调与外界的联系,从而努力尝试在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融入当地社会,实现身份的转化。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人无法迁移到更远的城市,从而只能在离家很近的地方工作。因此,他们就会对家乡产生很强的依赖感,“心有所牵”而无法完全抛弃自己农民的身份,对农村产生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然而由于

①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东莞农民工课题组”。东莞民工状况调查[EB/OL]. <http://www.cssm.gov.cn/neusite/view.php?id=31728>, 2010-11-30。

无法在经济上对城市产生依赖，在心理上对城市的归属感始终也无法产生，他们心中始终有着一种“乡土记忆”，“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常被激活和提取，进而影响甚至固化流动人口对自己身份的认同”^[22]。

(4) 城市体验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从表 5 的结果来看，“生活水平满意度”和“交往意愿”也通过了模型，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城市体验假设”。其中，生活满意度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产生正向作用，在调查中发现，流动人口对目前生活满意度在 5 分或 5 分以上（满分为 10 分）的比例高达 94.9%，而低于 5 分的只占 5.1%，生活满意度的均值为 6.57，比理论中间值（5 分）高出 1.57 分。这表明大部分流动人口对自己在城市的生活感到非常满意，他们也愿意留在城市中生活，尽管他们在流入地受到种种制度的限制，享受不到和当地人同等的权利，但是他们能够在流入地通过积极的策略寻求自己的存在点，加强和当地人的交流和沟通，在政府人为设置的“二元”机制之下，积极地寻找并筹划自己的生活，并在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等方面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实现身份的转化。

此外，本研究发现社会交往对身份认同也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社会交往有助于降低流动人口的心理成本和信息成本，“在和当地市民的交往过程中，他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现代理念和生活方式，无形中消解着乡土性的惯习和集体意识”^[23]，并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他们的城市认同感。然而在调查流动人口“平日里和谁交往最多”时发现，有 46.4% 的流动人口认为交往最多的是老乡和工友，和当地人的交往很少，只有 8.7%。这说明，当流动者迁移到流入地后，他们还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交际圈，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自愿性隔离”。社会范畴化是人类的一个本能，人们倾向于对群体进行社会分类和比较。流动者在进入流动地之后必然按照固有的“社会分层观念”对周围交往的人进行分层，他们更倾向于和那些“条件差不多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人进行交往，在日常生活中相互照应，相互帮助，从而在城市中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对自我进行定位的同时，也逐渐和当地市民产生了隔离，并在心理上对城市产生排斥和抵触的情绪。这样时间一长，流动者就会被城市人所遗忘，彻彻底底的成为“边缘人”和“过客”。再加上他们常常受到来自城市的歧视，这巨大的心理打击，更加剧了他们对流入地的排斥，进而阻碍了他们身份认同的实现。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采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0 年在 105 个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法探讨我国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被调查的一半以上的流动人口已经实现了身份认同，但是在其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和不一致性，即流动人口的认同愿望要远远高于内心认同。

通过研究发现：影响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因素不是同质的和单一维度的，而是复杂的，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制度、结构等宏观层面的制约，同时也有流动者心理、预期等非制度层面的影响。我们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发现，制度支持假设、个体特征假设、社会资本假设和城市体验假设在本研究中均得到了一定的验证。并且制度支持假设、个体特征假设、社会资本假设和城市体验假设是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主要限制性因素。

综合以上的研究可以发现，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关键不仅在于制度层面的变革，也在于非制度层面的变革。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变革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二元制度，取消户籍制度背后所承载的各项权利和福利，使户籍制度只作为居住在此地的一个证明，尽量缩小城乡二元间的差异，减少制度性转变带来的相对剥夺感^[24]，使流动人口享有和当地市民同等的政治参与权和表达权，加强流动人口对城市的归附感和依赖感，以强化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身份认同。其次，要坚持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就业制度，使流动人口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并能够和当地人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再次，通过社区组织介入，以专业化策略改善社区流动人口服务，

发展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社区项目^[25]，以促进流动人口与当地人的交流和理解，增强流动人口正面的城市体验，从而使他们在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实现身份的转化，完成市民化的转变。

参考文献：

- [1] Somers, Margaret. R. and Gloria D. Gibson. Reclaiming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 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M]. // Craig J. Calhoun.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1994.
- [2] 蔡禾, 曹志刚. 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2).
- [3] 刘传江.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J]. 理论月刊, 2006, (10).
- [4] 彭远春. 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 [J]. 人口研究, 2007, (2).
- [5] 朱力. 准市民的身份定位 [J]. 南京大学学报, 2000, (6).
- [6]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 [J]. 社会学研究, 2001, (3).
- [7] 同 [4].
- [8] 郭星华, 李飞. 漂泊与寻根: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二重性 [J]. 人口研究, 2009, (11).
- [9] 彼得·布劳著. 孙非, 张黎勤译.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 [10] 郑杭生, 陆益龙. 城市中农业户口阶层的地位、再流动与社会整合 [J]. 江海学刊, 2002, (2).
- [11] 詹姆斯·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12] 朱力. 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 [J]. 江海学刊, 2002, (6).
- [13] 柯兰君, 李汉林. 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14] 唐斌. “双重边缘人”: 城市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形成及社会影响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2, (8).
- [15] 同 [4].
- [16] 杨菊华. 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 [J]. 人口研究, 2009, (1).
- [17] 徐祖荣.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障碍分析 [J]. 党政干部学刊, 2008, (9).
- [18] 任远, 邬民乐.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文献述评 [J]. 人口研究, 2006, (3).
- [19] 陈琼. 移民妇女的身份认同: 对三峡库区两个案例的解读 [J]. 妇女研究论丛, 2007, (6).
- [20] 姜秀花. 社会性别视角在人口学领域的渗透 [J]. 妇女研究论丛, 2004, (4).
- [21] 何道峰, 萧延中. 异地就业: 扶贫与人力资源开发 [J]. 开放时代, 1997, (3).
- [22] 同 [4].
- [23] 同 [8].
- [24] 姚俊. 失地农民市民身份认同障碍解析——基于长三角相关调查数据的分析 [J]. 城市问题, 2011, (8).
- [25] 刘建娥. 乡-城移民 (农民工) 社会融入的实证研究——基于五大城市的调查 [J]. 人口研究, 2010, (7).

[责任编辑 冯 乐]